尚之信叛清投吴确凿无疑

——与李治亭同志商榷

薛瑞录

《清史研究通讯》发表了李治亭同志的《重访平南王尚可喜历史遗迹——与日本学者的共同考察》一文①，再次对尚可喜这个明清之际的重要人物进行探索。我拜读之后，获益良多。但是，他在文中以“尚之信叛清辩”的醒目标题，提出了尚之信没有叛清投吴、康熙对尚之信并没有以谋反论处、“三藩之乱”的习惯提法未必恰当等等新论点。我认为，他的这些新论点尚缺乏充足的根据，且同当时的客观史实不相符合，因而值得商榷。

李治亭同志在为尚之信的叛清问题辩护时，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他过分强调和相信尚氏族人关于尚之信从未参加叛乱的传闻和伪满康德六年（1939）修撰的《尚氏宗谱》中的有关记载。他一开头叙述了尚氏后人关于尚之信在三藩之乱中的表现及其死因的轶闻，然后断定，“从尚氏族人方面来说，他们始终坚持尚之信没有反叛，考之史实，确有许多疑点，能否构成‘反叛’，需要重新研究。”紧接着，他又大段抄录《尚氏宗谱》关于尚之信向吴三桂假投降的记载，进而写道：“《宗谱》明确地否认尚之信参加叛乱，指出：他是在广州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向吴三桂假投降，‘阳为顺逆，实保地方。’等待清兵南下之日，再举行反攻，尚之信此举作为一种策略，亦无可厚非。”

如所周知，尚之信被康熙赐死广州，迄今已过去三百多年。历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尚可喜的后代们有关尚之信的口碑与传闻究竟有多少史料价值，实在使人怀疑。例如，所谓尚之信代理王事以后，曾向朝廷上过九次奏折，“并得到了圣祖和朝廷的默认。”这在官私记载里均无反映。《尚氏宗谱》也只是这样简单记述：“丙辰春，（之信）遂身摄王事，以丸书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②北京图书馆藏伦明的未刊稿《尚可喜父子事考——清史谈屑之一》，在介绍他看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修撰的《尚氏宗谱》时，也涉及了尚之信：“丙辰春，遂身摄王事，以丸书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云云。”可见，无论是康熙年间修的，还是伪满时期修的《尚氏宗谱》，都只有“以丸书入告”的记载，而没有“以九疏入告”的内容。李治亭同志可能出于疏忽，将“丸书”错看成“九书”，尔后自改为“九疏”。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尚之信代理王事后，曾先后向清廷上过九份奏折的趣闻。至于《尚氏宗谱》，我也查阅了数遍，发现有些章节，如《先王实迹》等，确具较高的参考价值。然而，它也和其他姓氏的家谱一样，充满了明显的隐恶扬善的色彩，其中尤以粉饰尚之信在三藩之乱中的劣迹最为突出。因此，我们在使用《尚氏宗谱》的史料时，应该持审慎态度。

李治亭同志说：“《清圣祖实录》和其它文献都没有具体反映尚之信反叛的事实。”可是，根据我接触到的史料，情形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清朝文献和民间记载中有关尚之信叛清投吴的史料俯拾皆是，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些史料如何理解和如何对待。

俗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尚之信最后走上叛清投吴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他十九岁作为人质，由广州来到北京，从此他

借酒蘸愁，生活放荡，逐渐染上了酗酒嗜杀的恶习。据史载："俺达公尚之信，尚王可喜之长子也，酗酒嗜杀，壶樽杯斝与弓刀矛戟之属，随其所至，必兼携以行，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虽宠仆艳姬，瘢痏满体。"③又据与尚可喜共事多年、对尚氏家庭逸事了如指掌的广东西宁（今郁南县）知县王钺所记："之信有才略口辩，然酗酒好杀，每醉后，常手刃人，或缚而射之以为戏，比死乃已。"有一次，他同七弟、和硕额驸尚之隆一起畅饮，喝得酩酊大醉，他猝然拔刀刺向其弟，侍从急忙扑救，之隆侥免于难。和顺公主得悉后，奏告皇兄，顺治为之勃然大怒，谕令严惩其罪。④康熙十年（1671），尚可喜"虑其触冒法网"⑤，故以年老多病为由，疏请尚之信回粤代理军务，诏从其请。

尚之信回到广州。其暴虐本性不仅未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史称："之信既得王印，益骄怙，笞其前母舅及姑丈不恤，凡老王用事人，旧所不快者，小则鞭，大则杀，王无如之可。"⑥他专横跋扈，"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⑦他为了摆脱其父的干预，竟不惜万金，"营别宅以居，号令自擅。"⑧尚可喜稍加过问，他就不高兴，"出不逊语，王怒甚，然以嫡长故，又爱其才，终不忍有他意。"⑨对其众多的弟弟，他也经常加以排斥和谩骂："每宴集，之信常指问侍人：'此辈何为者？'或以阿哥对，则怒曰：'杂种耳，何阿哥为若是者！'老王皆闻之，诸左右及诸姬人日夜泣王前。"⑩因此，部属的不满和家庭的不睦，把年迈的尚可喜弄得焦头烂额，他的心腹幕僚金光即献上一计："谓朝廷方嫌尾大，计莫若率诸少子及左右亲信归耕辽东，避俺答去，朝廷必大喜，则君臣父子之好，可两全无祸。"⑪可喜颇以为然，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疏请以两佐领兵归老海城，让之信袭爵留镇。清廷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便以广东已经底定为词，命令尚可喜全藩北徹，不允许尚之信袭爵留镇。之信对此怨恨在心。

吴三桂反后，耿精忠、孙延龄和一大批明朝降将纷起响应。金光据此险恶局势，又向可喜进言："俺答公刚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请废而立次子固山（之孝）。"⑫可喜也"虑其拥兵速祸"⑬，因而毅然解除了之信的军权，很快得到清廷的同意。次年正月，康熙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为了笼络尚氏父子及其所属官兵，晋封可喜为平南亲王，任命之孝为平南大将军，之信则比其弟低一级，任命为讨寇将军，协谋征剿。

军权的消失和地位的被贬，给野心勃勃的尚之信以意外打击。从此，他怒火中烧，气恨其父，妒疾其弟，仇视金光，进而萌发了背叛清廷的心理。正如王钺所预料到的，"之信必反"⑭。恰在此时，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尚可喜气病交加，卧床不起，尚之孝又征战在外，广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加之吴三桂不断派人向尚之信进行策反工作，并以招讨大将军、辅德公等封号相许。于是，尚之信利令智昏，悍然在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二十一日发动兵变，叛清投吴。

据《清圣祖实录》载："先是吴三桂反，尚之信欲其父尚可喜从贼，迫之不已，尚可喜愤死，尚之信遂降贼。"⑮

又据官方奏报："时贼犯广东，总兵官苗之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易服改旗帜，遣人守其父尚可喜第，以炮击我营，倡众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⑯

当时在广东任职、目击尚之信发动叛变情形的王钺记载最详，今录其要者："吴逆既已

变，朝廷乃驰使止平南、靖南两藩，俾勿迁。其时，度吴逆交通之使，日夕在闽、粤，靖藩耿精忠少年狂惑，竟纳其邪说，称兵继叛，唯平南王守臣节特坚，方户部尚书梁公（清标）之复命也，王北面叩头曰：'愿寄语皇帝，老臣受本朝恩最深，惟一死报国耳，无烦皇帝南顾忧也！'嗣是而诸子及左右亲信旦夕进邪说，老王辄发愤骂曰：'痴儿，而翁食盐酱多于而辈食白米饭已矣，勿复言，而翁之天时人事已预定矣！'竟坚卧不动。""闻广州之变也，时平南昏髦，藩下诸将士奉之信为主，已暗通吴逆。一日，集将士向老王议事，未决，而之信已明令其母持剪刀剪王辫，将士乃齐呼老王爷已剪辫投降，讫王势不自由，遽投地得病，而之信则取印绶向伪逆纳款矣，王竟以是抑郁死。……当广州之初变也，王公大夫皆戴大帽，衣满洲袍，民间为之谣曰：'明朝头，清朝尾，过了三周年，依旧归康熙。'后卒如其言。"⑰

据时人、后任广东高明县知县的钮琇所述："丙辰二月，郑锦下东莞，马海雄入南，赵天元、谢厥扶俱以舟师迎降，之信计无所出，乃杀（金）光以辞于敌，谓向之抗衡上国，久持不下者，皆此人之为也，遂纳款伪周。时可喜屏居旧府，闻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殁。"又云："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约众谋逆，送印伪周，自称暂管辅德将军。"⑱

顾公燮的《丹午笔记》也载："三桂之史〔使〕日夕在二王所，怂恿二王反。当是时，耿仲明子继茂已前死，孙精忠嗣王叛应之。独可喜守臣节不变，晋封亲王，督抚以下皆听节制。顾金光者，浙江义乌人，号跛金，居中用事，为可喜草密奏，疏发之信罪状，请以次子之孝为世嗣。之信积不平，杀金光。甲寅六月，孙延龄陷梧州，明年高州之难作，之信遂劫父叛降三桂，可喜以忧死。"⑲

刘健的《庭闻录》还载："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马雄兵至新会，……杀掠男女无算，势且逼广州，尚可喜子俺达公尚之信被废怨望，矫父命叛降贼，杀父客金光，以谓向抗衡久持不下者，此人为之也。上表三桂，自称暂置辅德将军，移檄郡县，使皆纳款。"⑳

《清史列传》又载："十五年春，可喜卧疾，之信代理事，三桂诱其藩属从逆，水师副将赵天元、总兵孙楷宗相继叛，之信遂降三桂，遣心腹环守可喜藩府，戒毋得关白诸事，杀金光以徇，……之信遂授伪职招讨大将军、辅德公，与海贼议和，夺之孝兵柄，使闲居广州。"㉑

还有其他一些史料，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从上引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尚之信在三藩之乱中，背叛清朝，投顺吴逆，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这些史籍具体而又生动地叙述了尚之信叛清的原因、经过及其后果；尚之信发动兵变以后，他不仅剪辫、蓄发、换帽、易服、改旗，而且同驻守广州、肇庆等地的八旗兵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以炮击我营"，迫使镇南将军舒恕、副都统莽依图率领八旗部队撤出广东省境；尚之信为了维护尚藩的利益，虽未彻底投入吴三桂的怀抱，但他确实接受了吴逆授予的招讨大将军、辅德公和辅德亲王等伪职、伪爵；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等行政官员也都随尚之信一起叛清投吴，因而清廷对整个广东省的统治局面已不复存在。

尚之信率部叛清投吴事件震动了全国，使当时敌对双方的力量之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削弱了清朝的力量，助长了叛军的淫威，把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和郑经四股反清力量连成一片，合为一气，从而增加了清廷平叛战争的困难。因此，这对清廷来说怎么会是"一无所损"？！尚之信叛清后，只过了二百八十五天，就"遣人赍密疏至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

喇布军前乞降”㉒，这是真降吗？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认真分析，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促使他叛而又“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是他叛清之后，立即受到了来自三方的沉重压力。第一是来自吴三桂。王钺的《水西纪略》云：“既而吴逆亦恶之信之凶忍也，封拜皆草草，且征兵征饷之使日至，之信乃悔恨，越岁余，复叛归本朝。”《清史列传》亦云：“之信投顺三桂，冀为伪王，以逞骄志，及三桂与以辅德公伪敕册印，又遣马雄屯三水，索助饷银十万两，始颓然气沮，复谋归正。”“三桂屡胁之信出庾岭抗大军，之信赂以库金十万两乃已。”第二是来自清廷。尚之信叛变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康熙迅速采取了应变措施，大力加强了江西境内的清军，并加紧了对湖南吴逆的攻势，谕令“简亲王喇布即令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速取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剿御闽粤诸寇。”㉓第三是来自台湾的郑经。三藩乱起，郑经乘机大举兴师，派兵登陆，占领了福建、广东的沿海一带地方，这也使尚之信惴惴不安。

之信虽暴虐，但心计颇深。他在三方包围的困境下，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灵活地采用了对清军伪降、对郑经议和、对吴逆牵制的应变策略。而当时清军同吴军两强相争、鹿死谁手尚不明朗的客观形势，又为他采取这种策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策略，才使得他在数年时间里，坐山观虎斗，企图达到保存实力、以收渔人之利的目的。我们说尚之信对清廷的叛而复降系伪降行动，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战争史上，伪降之举，屡见不鲜。另外，按照常理，之信若是真诚投降，作为一军主帅，他起码应该服从清廷的命令，听从其调遣。可是，史实绝非如此。

康熙十六年（1677）六月，清军与吴军在湖南展开激战，清廷命令尚之信“率兵三路进剿”㉔，但他却以潮州总兵刘进忠尚未投诚为由，拒不从命。七月初，吴军数万攻占湖南永兴、郴州和宜章等地，欲犯广东乐昌、韶州（今韶关市）和江西南安（今大余县）等府县，康熙急令尚之信和镇南将军莽依图“亲统满汉官兵，速赴韶州，协剿湖南逆贼”㉕。之信依日不予理睬。没过几天，吴军进入粤北，围攻韶关，康熙再次严令尚之信“以其文到之日，即亲统官兵速赴韶州，与将军莽依图等并力剿贼”㉖。之信先是以台湾刘国轩部“占领惠州，直薄省城”，继之以“粤地土寇尚多，潮惠人心未定”为词，仍不听命。后来吴军攻打韶关失利，退回湖南，康熙又令尚之信率部速趋韶关，“由乐昌取宜章、郴州，则逆贼自难持久。”㉗尚之信害怕同吴军冲突，故照样置之不理，结果遭到了康熙的怒斥：“因平南王尚之信不亟发船至韶，致误军行，不可谓非王失机也。”翌年二月，吴军强化了对广西的攻势，清军将领频频告急，康熙即令尚之信亲统所部火速援救，他却以“今潮阳诸处又报海贼突犯，臣所属官兵有限，不能分应”㉘为借口，公然抗旨。三月，康熙诏令尚之信精选藩下官兵万人，开赴广西作战，并支付饷银二十万两给广西清军，他都迟迟不办。八月，三藩罪魁吴三桂病死，战局骤变，吴军众叛亲离，清军全面出击。战争的谁胜谁负，昭然若揭。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尚之信才一反常态，改变了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开始明显倒向清廷一边，“乃请自进广西”㉙，同叛军作战，由广东西部一直打到武宣。

李治亭同志在“尚之信叛清辨”中，还把尚之信同耿精忠作了比较，认为两人的罪恶性质“完全不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尚之信在有些方面比耿精忠走的还要远。例如，尚之信在叛而复降时，并没有象耿精忠那样向清廷交出伪印；他也没有象耿精忠那样亲自率领藩下官兵，迎接清军重新进入省境，而只是派遣其弟尚之瑛“赴韶（关）迎接王师”㉚；他更没有象耿精忠那样，复降后“即遣子入侍”，而“之信三子皆年长有室”，广东巡

抚金俊叫他送子入侍，刻不容缓，他却回答说：“天下未定，岂宜令孩童远行。”他还到处散布对康熙的不满情绪，据史载：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之信语督臣金光祖云，上欲我出兵，乃不与我一黄顶带。翌日复议，怒责盐驿道佥事李毓栋云，尔甫来此，事事与我违拗，我一刀砍尔，上亦无奈我何！”他又威胁金俊说：“非我归正，尔安得至广东，凡事当顺从我，不独吴三桂能杀巡抚朱国治也！”㉛广西巡抚傅弘烈也密疏弹劾：“之信归正后，怙恶不悛，在广东卖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敛横征。时而疏请出兵湖南，时而疏请出兵广西，及命下则一兵不发，目中竟不知有君命。”㉜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尚之信叛而复降后，依然是“异志犹存，叛心未已”。康熙对尚之信的伪降故伎早有察觉，“及其归正，仍怀两端。”㉝但他毕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故对尚之信始终采取招抚政策，对他的抗旨行为再三忍耐，甚至还大施笼络，让他承袭平南亲王和任命他为奋勇大将军。康熙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稳住尚之信，防止他重又倒向吴三桂一边，从而集中一切力量来孤立和打击吴逆这个主要之敌。魏源对此也写道：“初，尚之信之降也，仍怀两端，诏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兴，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听调遣。”㉞《清史稿》则记载：“尚之信之降也，仍怀贰志，返广东，复抗命。”㉟所以，我认为这里的“仍怀两端”和“仍怀贰志”，乃是对尚之信叛而复降系伪降的最好注脚。

李治亭同志的文章又说：“圣祖与议政王大臣对尚之信并没有以谋反论处。”其实不然。从尚之信发动兵变以后，清廷就一直把他看成叛臣逆子而恨之入骨，只是由于大敌当前，干掉他的时机尚不成熟，故把他放在一边，让其充分暴露。迄至康熙十九年（1680），全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清朝的巨大变化：叛军分崩离析，接踵投降；清军则越战越强，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四川和贵州等省，并乘胜向吴三桂的巢穴——云南昆明进击。在这种情况下，尚之信显然对清廷已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也不必担心他倒向叛军。于是，康熙果断决策，尽快根除尚之信这一祸害。同年三月，护卫张永祥、张士选秘密抵京，向朝廷揭发了尚之信的谋叛之罪。康熙立即指派刑部侍郎宜昌阿等前往广东调查，明确示意逮捕尚之信，但要做到“无多株连”㊱。六月，“和硕安亲王岳乐疏言，故平南王尚可喜妻舒氏、胡氏，首告逆子尚之信罪逆当诛，乞传谕官吏密图擒拿，请旨正法。得旨：尚之信并原告干证，著侍郎宜昌阿等押解来京质审。”㊲八月，康熙谕斥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闻南宁距云南边界仅距七站，向因逆贼尚之信、马承荫背叛，或未可轻进。今若辈皆已无济，复何瞻顾而迟延也！”㊳在这里，康熙既称尚之信为逆贼，又指明他的所作所为是背叛行动。而两广总督金光祖、广东巡抚金俊和都统王国栋等人“亦相继疏列其罪”㊴。八月二十八日，清军包围武宣，尚之信束手被擒，押回广州。之信不服罪，策动其弟之节、心腹李天植等诱杀王国栋，以示反抗。平南将军赖塔早已布防，很快镇压了叛乱者。康熙对此深恶痛绝，断然下旨：“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其余逆党尚之节、李天植等，悉按律正法。”㊵显然，这里的“不忠不孝”、“罪大恶极”和“其余逆党”等严厉之词，都有力说明康熙与议政王大臣对尚之信是以谋反律论处的。尚之信之所以没有象耿精忠那样被凌迟处死，不是因为他未构成叛逆罪，而是如康熙所云：“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

既然尚之信叛清投吴是铁一般的史实，康熙皇帝也始终是把尚之信当成叛臣逆子来对待，那么，当时和后人将尚之信列入“三逆”之内，我看并无不合适的地方；至于“三藩之

乱”的习惯提法，我认为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纠正或推翻这一概念的必要；称“三藩之乱”与称“三逆”，两者之间似无原则区别，因为称“三藩之乱”时，人们自然会知道这是指吴三桂、尚之信和耿精忠所发动的叛乱，而决不会误解成是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或耿继茂）所发动的叛乱。

上述意见可能是错误的，请治亭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

①载《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

②尚其亮：《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

③⑱钮琇《觚賸》卷8，《俺达纵暴》、《跛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⑥⑨⑩⑪⑫⑰王钺：《水西纪略》，载《世德堂文集》。

⑤⑦⑯㉓《平定三逆方略》卷1，卷1，卷23，卷23。

⑧㉙《清史稿》卷474，《尚之信》，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⑬㉑㉛《清史列传》卷8，《逆臣传》，《尚之信》。李文标点有误：“三桂遣心腹环守可喜藩府。”正确标点应该是：“之信遂降三桂，遣心腹环守可喜藩府，戒毋得关白诸事，杀金光以徇。”从行文看，之信是主语，而不是三桂为主语。史实也表明吴三桂并未派心腹包围尚可喜府第，而是尚之信遣心腹包围其父府第。因之，李文所谓“之信没有反对，意在借三桂之力，夺取王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⑭《清史列传》卷70，《文苑传》，《王钺》。

⑮㉒㉔㉕㉖㉗㉘㉚㉝㊱㊲㊳㊴㊵《清圣祖实录》卷91，卷64，卷67，卷68，卷68，卷70，卷71，卷67，卷91，卷89，卷90，卷91，卷91，卷91。

⑲顾公燮：《丹午笔记》，《三藩之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⑳刘健：《庭闻录》卷5，《称兵灭族》。

㉜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㉞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

㉟《清史稿》卷254，《赖塔》。